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

第九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民國 100 年 09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 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一樓會議室

主 席：甄曉蘭（臺師大教育系/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/院長）

導讀人：王雅玄（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/副教授）

蕭憶梅（國教院課程與教學組/助理研究員）

出席人員：甄曉蘭、陳麗華、黃春木、吳麗君、田耐青、桑慧芬、宋明娟、黃嘉莉、
林郡雯、李涵鈺、彭致翎、詹美華、黃文定、黃姿霓、王立心、陳珮璇、
翁琦惠

紀 錄：翁琦惠

一、主題：歷史記憶解構與和平教育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1. Waltz, K. (2001). *Man, the state and war: a theoretical analysis*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
2. Crain Soudien (2002). Memory work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future: A critical look at the pedagogical value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eace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155-164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3. Qiu, J. (2006).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a-Japan relations. *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*, 11 (1), 25-53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：

(一)甄曉蘭教授

就文章內容處理比較多的是 TRC(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) for peace，比較好奇的是如何與 memory work 來做連結？

→王雅玄回應：因為他們在處理 TRC 時，會去問受害人的過去經驗，而作者覺得受害者的過去經驗會被 TRC 所影響，說出 TRC 想要的，所以他不太相信 memory work，而是 remaking the future，雖然沒有明講，但是作者暗示著這些 memory 有問題。另外，有關多元文化教育部分，個人分享一個小故事。在某

年 AERA 年會中，有個韓國女博士生說，用韓文發她的名字很難，常造成她的困窘，是不是可以以一個個人而非韓國少數族裔來看我。多元文化鼻組 Bank 在會場中試圖讓這女孩回到 Bank 自己所倡導的多元文化教育，幫助韓裔女生解放她自己。我個人看法是：東方人比較內斂不喜歡分享的文化，反而被視為壓抑，要被解放，變成少數族裔中的「他者」，可是，是誰在談多元文化教育？

(二) 陳麗華教授

有時這要看採取那種正義的觀點，是轉型正義、報復正義、恢復正義，還是追溯正義。南非有原諒的傳統，所以這種正義才會被認同，大家才會願意去做。

→王雅玄回應：為了要重建就必須要原諒，要原諒就要陳述一些對他們有利的說辭。我們只是要能重建未來的一些自白，confession 可以得到赦免，得到這樣的結果就好，文章作者就是要批判這一點。臺灣有學者曾說 TRC 做的很好，但用這種方式做和平教育，那和平教育的價值在哪？

(三) 蕭憶梅助理研究員

作者對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批評滿合理，那另一篇臺灣的論文是如何說？

→王雅玄回應：因為他比較五個國家，盧安達、奈及利亞、獅子山、迦那與南非，相較之下南非是做得最好的。

(四) 林郡雯助理教授

1. 雅玄老師這篇讓我想到了之前導讀關於賽普勒斯教學的文章，賽普勒斯的老師覺得要杜絕各種磨難教學，讓大家踏出那個安全區，讓大家彼此理解（雖然之前是有仇很的）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和解。在那情況下，老師憑什麼認為他有辦法去 handle 這些情緒，背後是希望和解而預設一套劇本，這些是老師想做的而不是學生自己想做的，這也就像是 TRC 所做的。在和平教育中大家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，配合演出，情緒到位，常常有些事情會被忽略，和平整個瑣碎化。
2. 關於 pedagogical 要怎麼翻譯的問題，張建成老師提過一個說法，pedagogy 這個字主要就是訊息的交換，公共事務會有很多的訊息，溝通給大家知道。Pedagogical 如果翻譯成訊息、溝通、交換會不會比較容易理解？而不一定是翻成教學或課程。

(五) 黃春木老師

1. 真相的部分，歷史是在利益下形塑而成，我們常要對歷史抱著懷疑的態度，因為真相難以確認、正義也難以認定，所以才要做歷史研究，因為歷史研究是尋求真相的一個必要條件。有歷史研究未必能把真相釐清，但如果沒有透過歷史研究，那是更困難了。像記憶的部分，常常會有失憶、錯憶的狀況，在 70 歲去回顧年輕時的事情，這樣的說法是真的還是假的，是他 15 歲的感受還是

70 歲的感受？在時間上是要分開處理才對，但兩邊的討論都是有意義的。當然不可能針對每一個人去做口述歷史，要必須對其他各種方式去釐清記憶本身不同面向的內容，比如說，口述歷史的受訪者、學校的文件、當時相關的報導等；可以透過許多方式試圖釐清記憶本身不同面向的內容，以歷史研究的角度都是有意義的，而且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記憶在時間中的變遷過程。一個比較理想的歷史研究，不是要去界定什麼是最原始的狀態，而是要去釐清現在看事情的迷思，或是去看因果脈絡過程怎麼轉變的，這本身就很重要。歷史研究還是有必要性在，而不是只是一堆論述。

2. 228 的事件中，受害者是很有影響力與權利，兩者的論述能力跟影響能力是不一樣的。應該把受害者本身當成一個主體去思考，受害者如何去論述他的經驗、如何去看事件、如何去看加害者。在南非的事件裡，有沒有對 TRC 的政策方向具有影響力的受害者，他們是如何去論述其經驗，是可以討論的。
3. 無論真相或和解都是很困難的事情，且彼此影響，在實務上不太能兼顧，所以永遠都是目前暫時性真相跟和解，而這些又是不斷被定義的過程。

第二段討論

(一)李涵鈺博士候選人

1. 日本這股改寫歷史力量還蠻大的，後來的版本對二戰戰爭事件慢慢淡化，所以才會有日本缺乏誠意、沒有道歉感覺的疑慮。2000 年八家送審的教科書中有五家刪去慰安婦的史實，中日韓共構的歷史讀本主因是 2000 年很多教科書版本通過，刪掉史實而扭曲戰爭，才有中日韓的共構。
2. 南非 Tutu 大主教得過諾貝爾和平獎，因此看到 TRC 的過程好像跟原本的認知有衝突。TRC 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真相才会有和解，也許我們的 228 事件也是要先有真相才有和解。

(二)王雅玄副教授

歷史所收到的情感→而去批判→無法接受，這些人就要去接受批判教育學。對抗記憶、對抗文本，counter memory。歷史記憶常常變成我們的信仰。批判教育學常會去解構人的認同，歷史教科書卻很難放進批判的東西，教科書有歷史以來都在歌功頌德，造成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好感。所以歷史教科書常會塑造人們的認同。

→甄曉蘭回應：先有官方來形塑歷史記憶，還是我們的歷史記憶比較能接受官方版本？通常我們從小會被教科書所影響，到後來讀到的不同文本才興起許多衝突，而教科書如何來處理，也是該討論的問題，教科書不得不服膺集體記憶，不然會被抗拒。

(三)林郡雯助理教授

臺灣人沒有細緻處理情緒的習慣，日本人的戲劇通常會很精緻，把轉折思考交待得很清楚。臺灣從小不論是家庭或是學校教育，都沒有教導我們理性思考、處理我們的情緒，於是我們只好在電視裡找出口，即便再不合理也沒關係，那是一個宣洩，造成臺灣的本土劇異常長壽。從臺灣政治來看也是，很少做政策辯論，所以也不只是歷史方面的問題。

(四)吳麗君教授

1. 「大江大海」一書中提到，黃春明講起日本投降事件，對阿公來說很開心，爸爸卻很難過，因為在不同年代即使同一個家庭，對過去的記憶、國籍的認同也不相同。日本對於紀念館中反思的成分沒有很多，還是從日本的本位去看日本受到的傷痕，從臺灣人的角度會覺得輕描淡寫，沒有深刻的反省。
2. 一個臺灣心理學家，念小學時為日本時代，經歷光復年代，後來又到美國教書，人生經歷了三種文化。看到國旗從操場中升起的時候，對於國籍的認同有不同的感受；而這個心理學家常常用不同的三種語言演講時，就好像會變成三種不同國籍的人，因此，歷史的記憶對人們的形塑多少都有些關聯。

(五)黃春木老師

1. Paul Cohen 關於義和團的書是非常重要的，在討論「後現代史學」會被討論到，在一個文本中寫了三種關於義和團的歷史，很值得去看。
2. 黃春明的經驗，描寫宜蘭黃家屋簷下存在三種認同，黃春明爺爺是傳統中國的認同，他爸爸是認同日本，而黃春明自己則是受中華民國的影響，祖孫三代接受的國族認同不太一樣，進而反應臺灣在近代歷史上錯縱複雜的面向。
3. 南京附中跟建中有交流，和平教育在許多個案中是有階段性的進展，由南京附中的文本來看，大概還在尋求真相的過程；對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件，日本希望能透過和平教育方向去處理，利用高中生交流來傳達真相。

五、散會：12:00